



国家权力与 个人自由

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英】赫伯特·斯宾塞 著 谭小勤等 译



华夏出版社

★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

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

【英】赫伯特·斯宾塞 著 谭小勤等 译

华夏出版社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英)斯宾塞(Spencer, H.)著;谭小勤等译. - 1版.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9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霍桂桓主编)

ISBN 7-5080-1961-X

I. 国… II. ①斯… ②谭… III. 斯宾塞, H. (1820~1903) - 政治思想

IV. B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1342 号

责任编辑 魏云鹏

装帧设计 陶建胜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20千字 印数7000册

2000年1月北京第1版 200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3.00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编委会

主 编：霍桂桓

副主编：林 信 鲁旭东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寅卯	王才勇	何卫平	张廷国	张百春	杨富斌
陈春文	陈 默	单士联	林克雷	林 信	强世功
韩东晖	鲁旭东	霍桂桓			

110-413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总 序

社会的发展,科学的昌明,思想的进步,永远需要某种有着丰富养料的环境。这种环境在所有有理智而又不乏灵气的人们心中,首先便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累积。近代中国,自十九世纪中期以降,许多学者为此倾力于西方典籍的传译,成绩斐然,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学者研究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新作迭出,这些新作对于当今中国广大读者,显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此,翻译出版现代西方思想名著,尚有许多工作可做。

如同读者所知,现代西方思想不仅源流学派异彩纷呈,而且显示出深层转变而日益走向综合发展的趋势;同时,这一令人捉摸难定的趋势,又隐约显示出深远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学理的传承相继。“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的创设,恰好立意在接续先贤传译西方思想经典的伟业,为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理解和借鉴现代西方思想的精华,提

供基本的养料或食粮，以期看到我们思想界、学术界在荆棘与鲜花并见的求索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选译的著作，在力求反映现代西方思想学术的独创性与思维深邃性的同时，尤其注重思想的全面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现代西方的思想佳作，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广义人文科学，无论是既已成为主流学派的名家大作，还是依然在支流思潮中涌动强劲的新秀新作，无论是以思想观念的独创性而特立独行于人类思想史的“义理之学”，还是将研究方法的更新变换纳入漫漫思想长河的“考据之学”，凡此种种无不在搜罗之列。我们的译介，尤其倡导严谨求实的学风，以研究探索性翻译为译事所追求的目标；“勿以译为讹为托言”，应当成为我们以及我们的译者们的座右铭。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既是一项恢宏繁复的工作，也是一份至为艰巨且任重道远的事业。在这项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在此项事业发展的旅途上，我们首先应当由衷地感谢那些关注这一文库的读者们。同样，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养料或食粮的思想家们以及把这些材料传译过来的人们。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在我们的期盼中将会扶助并参与到此项事业中的人们。

谨此为序。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目 次

前 言	(1)
新保守党	(3)
即将来临的奴役	(21)
立法者的罪	(47)
伟大的政治神话	(80)
后 记	(116)

前 言

一八六〇年四月的《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登载了一篇题为“议会改革:风险和防护”的文章。其中,我斗胆预测当时人们提出的政治改革建议将产生的某些后果。

简言之,该文主张:除非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否则形式上自由的增加,随之而来的会是实际的自由的削减。始自彼时的立法变动正如我所预见的。独裁措施的急剧增多,导致逐渐削减个人的自由,并业已成倍地削减了个人的自由。规定逐年增加,约束公民以前未受抑制的方面,强迫公民做以前由本人决定或做或不做的事。同时,更沉重的公共负担,主要为地方负担,进一步地限制了公民的自由,其手段是减少公民本可随意支使的收入之份额,并加重取自公民的份额,随意用于公共机构的开支。

导致上述后果的原因当时存在,现在也存在——事实上,这些原因有可能进一步被强化。发现自己所做的预测准确无误后,我立即着手对未来做出预测(结论与前类似)并强调之,尽我绵薄之力唤醒人们

注意到可能出现的弊端。

以下四篇文章就是为此目的而作的,最初发表于今年二月、四月、五月、六月和七月的《现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为应付某些责难并摈弃一些可能引起的异议,现加一附言。

贝斯沃特(Bagswater),一八八四年七月。

新保守党^[1]

目前那些被视为自由党党员的大多数人，都是新型的保守党员(Tories)。这是一个我打算证明的似非而是的说法。由于我将证明它，首先我必须指出此两政党的原型，其次我必须请读者们耐心听我提示他所熟知的事实。关于严格说来的保守主义(Toryism)和自由主义的固有本质，我将让读者们对之留下深刻的印象。

追溯到正式命名前一个更早的时期，首先这两政党分别代表两种互相对立的社会组织，主要区别为一方尚武一方推崇工业——一方以地位的体制(régime)为特征，这在古代几乎很普遍；另一方以契约的体制为特征，这在现代社会逐渐普遍，主要流行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如果我们不用“合作”这一单词的有限意义，而用其最宽泛的意义，如表示任何管理体制下公民的联合活动；那么，这两个政党可分别以强制的合作体系和自愿的合作体系限定。我们看其中一个政党的典型结构：在由应征士兵组成的军队中，各个军衔的分队必须冒着死亡的痛苦服从命令，接受按比例分配的食物、衣物和津贴。而我

们看另一政党的典型结构：一个生产者或销售者的机构，分别同意具体的服务换取具体的报酬，如果员工不情愿，在事先的通知后他们可任意离开该组织。

英格兰社会发展期间，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合作形式的区别逐渐出现。但在保守党(Tory)和辉格党(Whig)^[2]的名称投入使用的很久以前，两党便渐露雏形，它们各自与尚武精神和工业主义的关系也隐约可见。各地由工人和商人构成的城镇居民已习惯于依契约合作，反对以强制统治为特征的等级合作，这是人们熟知的事实。相反，屈从于地位的合作，产生并适应于长期的战争，在军事首领及其依附者起初居住的乡村地区得到支持，这些地区保存着原始的观念和传统。此外，政治倾向的矛盾，显露于辉格党与保守党的原则清楚地区分之前，后来也不断显露。大革命(Revolution)期间，“村落和小城镇被保守党完全控制，大城市、工业区和商业口岸则构成辉格党的根据地”。而且不论例外的情况，类似的普遍关系仍然存在，无需加以证明。

正如其起源所表明，两党的本质亦颇为类似。现在，让我们观察两党早期的纲领和行动是如何表明其本质的。辉格党主义始于反抗查理二世(Charles II)^[3]及其五大臣小集团(cabal)^[4]努力重建不受抑制的君主权力之时。辉格党党员“将君主制视为一种国家机构，由国家为其所有成员的利益而建立”；保守党则认为“君主是上天的代表”。这些信条涉及到信仰，前者认为庶民对统治者的服从是有条件的，后者认为是无条件的。大约五十年前，博林布鲁克(Bringbroke)^[5]按十七世纪末的构想，在其《论政党》(*Dissertation on Parties*)中如此描述辉格党党员和保守党党员：

人民的权利和权威、一个新的契约、议会的权力和自主、自由、反抗、拒绝、弃权、罢免，那时这些观念联结成一名辉格党党员

的观念。而且每一名辉格党党员认为自己的观念与托利党党员
的观念是不可交流、相悖的。

神圣的、世袭的和不能废除的权力、直系的继承、特权、不反
抗、奴役,有时也包括罗马天主教,被慢慢联结为一名托利党党员
的观念。同样,他们也认为辉格党党员的观念是不可交流并相悖
的。——《论政党》,第5页。

如果我们对比这些描述,会看到一政党渴望抑制并削弱统治者对
国民的强制性权力;另一政党则想维持并增强其强制权力。其目的的
区别——在意义和重要性方面超出其余所有政治差别——表现于其
早期活动中。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6]法官独立于国王的
法令和击败效忠宣誓法(Non-Resisting Test Bill)(此议案建议强迫立
法者和官员发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以武力反抗国王),都是辉格党
原则的例子。后来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7]藉以保护国民反抗君
王的侵犯,也是辉格党原则的例子。这些法案具有相同的内在本质。
贯穿社会生活的强制合作原理被它们削弱,而自愿合作的原理被强
化。随后一段时期,辉格党的政策具有相同的普遍倾向。格林先生
(Mr. Green)关于安妮死后辉格党掌权时期的评论,对此做了充分说
明。

其统治还未足五十年,英国人已忘记由宗教信仰不同引起的
迫害、压制新闻自由、干预司法管理和非议会统治是可能
的。——《简史》(*Short History*),第705页。

现在,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战争时期,以前赢得的个人自由的
扩展不复存在。特有的尚武社会类型的倒退通过各种强制性措施表

现出来,这些措施包括从那些为战争目的以暴力夺取公民的人力、财产到那些镇压公共集会和试图压制新闻的措施。抛开这些不谈,让我们回忆重建和平后工业体制之复兴及恢复适当的结构类型之后,辉格党或自由党推动的那些变化的普遍特征。辉格党的影响日增,开始废除禁止工匠团体结社和那些干涉其自由旅行的法律。在辉格党的压力下,法令允许新教徒有信仰自由,不承受任何世俗的处罚。而且托利党被迫施行辉格党的法令,使天主教徒能宣称信仰其宗教,而不丧失自由。通过禁止购买和奴役黑人的法令,自由的领域被拓宽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被废除,与东方的贸易全部放开。通过选举法修正案(Reform Bill)和市政改革法案(Municipal Reform Bill),在立法机关没有代表的政治农奴制的地域被缩小了。所以,同样逐渐地、局部地处于少数人强制之下的广大民众的数量减少了。新教徒们不再被迫服从婚姻的教会形式,能自由地以世俗的仪式结合。后来,减少和消除了关于购买外国商品和雇用外国船只、海员的限制。再后来,废除关于新闻的那些束缚,它们的本意是阻碍观念的传播。所有这些变化,不论是否由自由党自身引起,它们与自由党宣称并推行的原理一致,这是无可争论的。

但为何我列举的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正如开始提到的,只需要提醒众人过去的自由主义是什么,他们就会觉察到它与现今所谓的自由主义的不同。如果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已忘记了它们的共同特征,那么为着指明与它们相同的特点之目的而指出这些各种各样的特质,是不可宽恕的。他们没有记住,在这个或那个方面,所有这些真实的自由党的变革减少了贯穿社会生活的强制性合作而增加了自愿合作。他们已经忘却,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它们削弱了政府的权力范围,扩大了公民能自由行为的领域之范围。他们已经忘记这一事实:过去,自由主义惯常支持的是个人自由,反对国家强制力。

现在试问——自由党人是如何忘记这一点的？自由主义是如何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在立法中是如何变得越来越专制？是直接通过其自身的大多数，还是通过间接向反对派中的大多数人提供帮助（有如在此类事例中），自由主义是如何采取强行规范公民行为的政策，结果却缩小了公民自由行为的范围？我们如何解释导致这一情况的混乱思想不断扩展，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追求公共利益，实则颠倒了早期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法。

乍看之下，尽管政策的这种未察觉的变化似乎是不能解释的，我们将发现它的出现是极其自然的。考虑到政治问题常常是不可分析的，并且，在现存条件下，不可期望任何事发生。为使之明了，一些附带的解释是必须的。

从最低等到最高等的生物，智力通过分辨事物而得到发展。它在人类中继续发展，从最野蛮的人群到最文明的人群。为正确地分类——将本质完全相同的事物归入同一组，而将本质完全不同的事物归入另一组——是正确指导行为的基本条件。以初步的幻象(*rudimentary vision*)为例，它发出警告：某种大型的不透明物体正在逼近（如同一个人紧闭双眼移至窗口，感觉眼前一只手掌的阴影，告诉我们有物体在前方移动）。这一过程形成图像，通过对形状、颜色和运动的准确鉴别组合，从而辨别远距离的物体是猎物还是天敌，从而可能促进捕获食物或躲避死亡的行动之调整。对异(*difference*)的认识的不断进步和随之而来的分类的高度准确性，在其一个主要方面之下，构成智力的发展。我们从相对简单的物质幻象到相对复杂的心智幻象——先前以某种外在相似性或某种外部环境区分事物；后来，分组更真实，与内在的结构或本质相一致。未成熟的心智幻象恰恰与未成熟的生理幻象一样，在分类上是模糊的，错误的。以早期的植物分类为

例,乔木、灌木和药草大小不同,这一最明显的特征是区分的基础。这种归类方法聚合许多本质极端不同的植物,却把它与近似的植物分隔开来。或者更甚,采用通俗的分类方法把鱼和有壳的水生动物(虾、螺、贝等)归在同一名下,或把甲壳纲动物和软体动物归入有壳的水生动物这一亚名之下。更有甚者,将鱼视为鲸目哺乳动物。部分因为生活方式相似,如居于水中,也部分因为某些其它特性相似,有些生物在其本质特征上差距之大有如鱼鸟之别,却被归于同一纲或同一亚纲之中。

现在,上面举例证实的普遍事实也适用于智力幻象的更高级领域,即那些不为感官所直接感知的事物以及政治制度、政治措施之类的东西。因为在认识这些事物时,由于智力的缺乏,或文化水平的不足,或两者兼而有之,结果导致错误的分类,随后做出错误的结论。实际上,此处错误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为思维能力关注的事物并不容许以同样简单的方式进行检验。你不能触摸或看到一项政治制度:它只能通过积极想象的努力被了解。你也不能通过生理感觉理解一种政治措施:这居然要求一种心理表述的过程,其要素通过此过程被归入思维(thought),并表达了这种组合的固有本质。因此,这里的情况仍超过上面列举的例子。有缺陷的智力幻像在以外在特征或外部环境为标准的分组中体现出来。源于此因,制度是如何被错误地分类?我们看到普通观念以为罗马共和国是一种民主的政体形式。调查法国革命者的早期观念,他们的目标是建立理想的自由国度,你发现罗马的政治形式和行为是他们的模型。甚至现在你也会找到一个历史学家,他将罗马共和国的腐败作为示例,藉以向我们表明民主的政体所导致的是什么结果。然而罗马的制度和所谓的自由的制度间的类同,是小于鲨鱼和海豚间的类同的——相同的外表形态而迥异的内部结构。因为罗马政府是一大型寡头统治中的一个小型寡头统治,每一

位成员都是不受约束的独裁者。一个社会内相对少数的人拥有政治权力,享有完全的自由,他们是如此众多的小型暴君,不仅占有奴隶和依附者,甚至还奴役儿童,有如占有其家畜。与这种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是普遍的专制主义,而不是政治上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是出于其固有的本质。

现在转到我们的特殊问题,我们会理解这种混乱,自由主义在其中迷失了自我。导致这种结果的那些政治措施的错误分类之缘由——已如我们看到的——是依据明显的外部特征而不是内在本质的分类。在民众看来,在实施这些措施的人看来,自由党人过去推行的变革目的何在?是人们或一部分人们遭受的苦难之废除:这是这些变革的共同特征,在人们脑中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弊端的减轻,弊端曾被广大的市民阶层直接或间接地认为是导致痛苦和阻碍幸福的原因。而且因为在大多数人头脑中,一项改正的弊端等同于一项获得的利益,这些措施开始被认为是许多积极的利益;自由党政客和自由党选举人都把众人的福利视为自由主义的目标。因此就导致了混乱。大众利益的获得,是早期自由党措施的共同的外部明显特征(当时每一措施实施的结果是控制的松弛)。大众利益现在开始被自由党人追求,不是作为通过控制的松弛间接获得的结果,而是直接获得的目的。为试图直接达到目的,他们使用与以前本质相悖的方法。

现在,目睹这种政策的逆转(或者我该说部分的逆转,因为最近的丧葬法案(Burials Act)和废除所有现存宗教不平等的努力,在某些方面表明了过去政策的延续性),让我们开始关注近期施行的政策逆转的幅度有多大;如果目前的观念和情感继续占主流地位,将来政策逆转的幅度又会大到何等程度。

开始之前,最好声明本人无意随意揣度先后促发这些限制和命令

的动机。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动机都是不赖的。必须承认一八七〇年法案对土耳其茜红染布厂(Turkey-red dyeing works)雇用妇女和儿童的限制,其用意与爱德华六世(Edward VI)^[8]的法令同等慈善,后者规定了一个工匠的最低工作时间。毫无疑问,一八八〇年的种籽供应法案(Seed Supply [Ireland] Act),授权保护人为贫困佃户购买种籽并留意其适当的种植。它是为公共福利的欲望所驱使,与一五三三年关于每个佃户可拥有绵羊数量的规定和一五九七年关于破败的饲养业房屋应该予以重建的命令同样伟大。没有人会怀疑近年来为限制出售烈酒采取的各种措施,是出于公共道德的考虑,正如旧时为控制奢华而采取的措施,亦如十四世纪时饮食和衣着都被加以限制。每个人都看到亨利八世(Henry VIII)^[9]颁布的法令,禁止下等阶层的人玩骰子、扑克、地滚球戏等,正如后来为抑制赌博通过的法令,都是为公共福利的愿望所驱使。

再者,在此我的确不打算质疑这些现代干预是否明智,即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竞相采取的干预措施;也不愿质疑过去的干预措施(在许多情况下新旧干预措施有类似之处)是否明智。在此我不会考虑近年来采用的保护海员生命的计划,与十五世纪中叶在整个苏格兰禁止船长冬季出海的法令相比,是否更明智或同等明智?与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10]制定法律强迫海港的旅店主发誓寻找他们的客人以防止钱币或金属的输出相比,是否存在更正当的理由让卫生官员有权搜查不卫生的食物,我们将不予置评。我们将假设运河船法案(Canalboat Act)的条款(禁止船主免费载船工的小孩出航)与斯皮特尔菲尔兹法案(Spitalfields Acts)具有相同的意义。后者为维护工匠的利益,直到一八二四年一直禁止制造商在距伦敦交易所(Royal Exchange)十英里内建厂。

于是,我们排除这些出于慈善动机和明智决策的问题,而视两者